

## ※序跋選錄※

# 《清代揚州學術》導言

楊晉龍\*

### 一

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在強烈經世致用企圖的終極關懷下，表現的內容與成就，根據一般性學術共識的意見，大概可以承認是由於受到不同時期社會與政治的實況之刺激與鼓舞、學者研究方向的不同選擇、經濟發展狀況的助力與面對現實狀況的需要，以及學術自身發展等等，這些與學術發展關係密切的內在「連續性」與外在「斷裂性」因素，交錯互動而形成錯綜複雜關係的影響作用，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學術面向；亦即傳統經學相對於現代式學科經學「超歷史」的運作方式，實際上是以一種針對性「歷史式」的思考模式在運作，傳統經學實際針對的現實對象，至少可以包括「政治社會事件」與「學術相關事件」，因而傳統經學解讀的重點：一在改善包括現在與過去既存的，以及將來或可能出現的社會政治問題；二是接受發揮或拒絕駁斥當代及過去的學術觀點或解讀內容。可知傳統經學研究必須直接考慮到相關的學術與政治的實際表現，亦即在研究之先就已經把實際參與當代社會的經世實踐觀納入考慮，所以原則雖可以是「萬世不變」，但結果當然可以是「與時俱變」，因此若不過度執著於某一類學術內容做為「唯一」真理的衡量標準，則大概可以承認在不同時期（如何有效而適當進行學術分期，當然是另外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與不同地域，都有其與眾相同與不同的一面。有清一代學術的發展自也不能例外，在二百多年中不同時期與地域的學術表現，當然也都有其各自的特色，然而近代絕大多數研究者比較集中注意的焦點，無疑是乾嘉時期的學術，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多數學者認為乾嘉時期江浙地區的學術表現，正是處於清

---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代學術發展上承先啟後的高峰期，亦即認定乾嘉學術能夠有效地將上承自清初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等學者開展出來，從比較重視形上義理發揮的「理學」，回歸到比較重視訓詁義理實踐的「經學」的學術路向，並予以發揚光大；同時也認為在此「經學」學術的主導下，開展出鴉片戰爭(1842)以後清代的其他地區的學術走向。

現代學者對過往既存歷史學術表現的研究，在求其系統性瞭解的前提下，多會盡可能結合某特定時空學者的共同特色，予以分門別派，對乾嘉時期學術研究者主要根據學者在學術認同與方法表現及其生長地區的不同，分成以惠棟(1697-1758)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1724-1777)為宗師的皖派，但其後在張舜徽(1911-1992)刻意突顯表彰的影響下<sup>1</sup>，「揚州學派」則逐漸被學者承認是繼吳、皖兩派而起的另一個學術家派<sup>2</sup>。就張舜徽的觀點而言，「揚州學派」既有地域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學術的意義，於是有關清代揚州在文化、學術、經濟等等各方面發展的狀況，逐漸成為清代學術研究重要的專門項目之一<sup>3</sup>。近年來更在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與大陸

<sup>1</sup> 張舜徽先生舉出二十多位揚州學者，認為他們的治學具有「博通」、「圓通廣大」等共同特點，以為該派的治學方式與方法，誠然也有不足之處，但相對於當時「篤信謹守、褊狹拘隘的學術氣氛」，則揚州學派「所獨具的精神和風格」，不僅具有「客觀上的進步作用」；並且對當時「煩瑣」的治學風氣及「談不上個性發展和見解創闢」等的研究缺陷，具有相當大的彌補作用。見氏著：《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清儒學記·揚州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學習揚州先輩的治學精神走博通的路〉，《訥庵學術講論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頁35-39等處陳述的相關的意見。順著張氏思路以論揚州學派之發展歷史者，可參羅熾、胡軍：《經學與長江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49-163的討論。

<sup>2</sup> 這種學派的分類必然是一種純「理想型」的設想，分類的背後涉及學者未曾明言的個人學術判準，當然無法達到令所有學者「普遍性」承認的共識要求，出現爭論是理所當然的表現。例如劉再華出版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的書，不僅只分為吳、皖兩派，同時還固守乾嘉學術「崇尚考據訓詁的漢學佔據學術的主流地位，漢學與宋學的門戶被嚴格地區分」等一類早就被糾正的錯誤觀點，見劉再華：《近代經學與文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31。即使是錯誤的觀點，某些學者依然還是以傳述故舊而錯誤的觀點為滿足，何況是一種與故舊觀點不太符合的創新觀點，其無法取得共識，應當是非常正常的表現。有關乾嘉學派畫分的歷史發展實況與爭論，可參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11-113的相關討論。

<sup>3</sup> 其他專著與單篇論文不論，姑以最能呈顯學術走向的學位論文為例，以大陸一地而言，至少就有：張宇星：《城鎮生態空間理論：揚州城鎮群空間發展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建築設計及

揚州大學等相關學者的帶動引導下，「揚州學派」的相關研究有逐漸興盛之勢，有關海峽兩岸合作進行此一學術研究的發展狀況，大致可以做如下的說明。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自民國八十一年開始，在林慶彰先生(1948-)領導主持下，進行清代經學的相關研究，除在當年舉辦一場「清代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外<sup>4</sup>，並成立「清代經學研究室」，繼續推動清代經學的相關研究，接著在民國八十二年舉辦一場清代乾嘉學術的座談會。經過多年準備之後，從民國八十七年起，開始執行清代乾嘉經學的研究計畫，至民國八十九年共舉辦過四次相關的學術討論會，這些討論雖不免涉及「揚州學派」的學者<sup>5</sup>，但並非專門針對「揚州學派」的研究。真正集中研究「揚州學派」的計畫，則是在民國八十七年七月開始執行的「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主題計畫」，首先是在民國八十八年一、二月間到揚州進行學術考察，目的除探訪揚州學者相關的古蹟及瞭解現代揚州人與學者，對這些歷史學術人物的評價外，更希望與當地學者進行實際交流，甚至更進一步引發當地學者研究的興趣；其結果除促成乾嘉時期相關學者著作的點校出版外<sup>6</sup>，還包括民

---

其理論博士論文，1995年）；李貴生：《清代揚州學派文學思想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1999年）；葉美蘭：《柔櫓輕篙：1895至1937年揚州城市現代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0年）；葉蕾：《論清代揚州八怪繪畫藝術的商品性和自娛性》（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01年）；李芸：《歷史文化名城的旅遊開發模式與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以揚州為例》（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文，2001年）；馮乾：《揚州學派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3年）；吳蘊豪：《「揚州十日」及其歷史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4年）等等討論揚州城鎮空間、都市文化、文學思想、藝術與旅遊、學術內涵等各方面問題的學位論文。另有推廣簡介揚州學派的論著，如趙航：《揚州學派概論》（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一書。

<sup>4</sup> 會議論文經相關審查手續後集結成冊，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

<sup>5</sup> 內容參見集結此四次研討會成果的論文集，其中至少有七篇論文係針對揚州學者的研究，見林慶彰先生、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

<sup>6</sup> 稍舉數例以明之，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的相關點校成果，如：王清信與葉純芳點校的《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林子雄先生（廣州中山圖書館）點校、楊晉龍校訂的《劉壽曾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沈津先生（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編著的《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彭林（北京清華大學）點校的《禮經釋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國八十九年四月與揚州大學合辦「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sup>7</sup>，以及民國九十年五月在臺灣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舉行的「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清代揚州學術》一書即此次研討會實際成果的展現<sup>8</sup>。

## 二

清代揚州學派主題計畫的研究對象與內涵，並未侷限在張舜徽定義之下，較為狹義的「揚州學派」之範圍內，因此舉凡與揚州學術相關的內容，均在研究界定的合法範圍內。諸家研究內容的範圍，大致可以借用歷史科學的三層次說來加以說明：即第一層次研究整體學術經驗的總和性表現，如探討揚州學派的整體特色、發展與影響；第二層次研究探討某一學術現象綜合性表現，如分析揚州學派對《十三

---

2002年）；楊晉龍主編點校的《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等等。揚州方面則有田漢雲點校汪中的《廣陵通典》；曾學文點校：《揚州十日記》；許衛平、吳善中點校：《咸同廣陵史稿》（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蔣孝達與陳文和校點董玉書的《蕪城懷舊錄》與徐謙芳的《揚州風土記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文化揚州」：<http://www.whyz.com.cn/>的報導，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正承擔《嘉定王鳴盛全集》、《汪中著作輯校》等古籍文獻的整理和校勘工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10月的報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已完成一部將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十九年（1839）重要學術史實一一加以著錄的《乾嘉學術編年》，見<http://www.cass.net.cn/webnew/index.asp>網站的引述；據「江蘇新聞網」：<http://www.js.chinanews.com.cn/2004-12-20/1/9056.html>2004年12月的報導，中國《清史》編纂委員會將編纂以吳、皖、揚州等學派，在經學、小學等方面，取得輝煌成就的汪中、焦循、阮元、高郵王氏父子等為主要內容的《清史·樸學志》，這也是與乾嘉學術研究關係密切的研究。

<sup>7</sup> 此次會議發表的論文，經審查改寫後，收入祁龍威先生、林慶彰先生主編：《清代揚州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一書。

<sup>8</sup> 有關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清代揚州學派的研究計畫，以及西元2000年之前有關揚州學術研究的概況，可參見《漢學研究通訊》第19卷第4期（總76期）（2000年11月），頁581-624收錄的林慶彰先生：〈「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畫述略〉、賴貴三：〈清代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的成果與貢獻〉、楊晉龍：〈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略〉、蔣秋華：〈大陸學者對清乾嘉揚州學派的研究〉、張壽安：〈清代揚州學派研究展望〉等文；以及祁龍威先生：〈對「揚州學派」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3期（總35期）（1999年9月），頁185-187的介紹。有關書畫藝術方面的研究狀況，可參見李中華：〈20世紀揚州八怪研究綜述〉，《孝感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2004年1月），頁45-47。

經》或各經的綜合性研究狀況或表現；第三層次研究單一專門學科與學者表現的實況，如某一學者個人或某一學者對某一書籍的研究表現等等<sup>9</sup>，因而諸如：學派整體與個別學者的學術表現、學術成就、治學方法與學術淵源、後續發展等等問題，以及促成此地區學術與學派萌芽、形成與發展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等相關因素，均在研究之列。張其昀〈論揚州學派的漢學精神〉即在論證揚州學派是否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治學精神，該文通過對汪中(1744-1794)、王念孫(1744-1832)、阮元(1754-1849)、焦循(1763-1820)、王引之(1766-1834)、劉寶楠(1791-1855)等揚州學者，在學術研究與經世時務的實際表現，因而證明「博採」與「務實」的治學精神，就是揚州學派共有的「漢學精神」，並進而探討此種治學精神可能產生的歷史效應及其對揚州學術發展的正面作用，最後並認為此種「漢學精神」啟迪了王國維(1877-1927)「二重證據法」的出現，這當然是承續張舜徽觀點而轉向於較細緻的學術內涵的發揮。

揚州學者的治學方式固然有其正面的效應，但同時也可能因為朝向某一偏向發展，因而出現某些值得注意的負面傾向，龔鵬程先生的〈語文意義的詮釋〉即透過戴震治學方法的轉折，以論清代乾嘉以來直至現代的中國學術研究，有關學術內涵的演變趨勢及其產生的問題與補救方式。此文細考戴震「因言以明道」之義，被其學術繼承者如王氏父子與段玉裁(1735-1815)等的扭曲窄化，轉成為狹隘的「因聲求義」的方法，於是導致整個中國學術研究，逐漸發展而走向科學實證主義的治學方式，因而失去對「道」或「義理」的直接關懷；此種走向頗有類似於西洋近代哲學所謂「語言學轉向」後所形成的純客觀的「語言哲學」之處，因而造成理解上的迷失。但此種發展實非戴氏本意，戴氏治學所持的觀點，實際上是類似於近代西方詮釋學那種綜合方法性、本體性與語言性的深層理解，因而可以比較有效地達到「明道」要求的詮釋方法。不過龔先生認為此種詮釋學的方法也有陷入「語文分析」困境的危險，因此需輔以「處境分析」的方法以救其可能出現的偏向，如此方比較有可能回歸到戴震原本追求「明道」的根本要求上。此文經由檢討乾嘉學者「誤讀」戴震的歷史實證分析，不僅探討揚州學派在方法學上的偏向，同時也探討

<sup>9</sup> 此研究內容三分層次之論，係借用張研：《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從清代基層社會組織看中國封建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演變趨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6-7的討論而成。

臺灣學術界對乾嘉學術偏向的承續、發展與轉變的過程。龔先生最後並認為現代臺灣學術界的研究走向，乃是逐漸融入西學精神，慢慢地脫離乾嘉後學與五四客觀考古等觀點的束縛，趨向於回歸或復近於戴震正常詮解路向的一種發展過程。

學術研究必然是學者與研究對象結合的結果，因而除揚州學派整體治學精神及其發展與產生的問題、矯正方式等與學者相關的總論性議題之外，有關揚州學派在個別學科研究範圍的總體性表現，應該也是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議題，蔣秋華的〈清代揚州學者的〈禹貢〉研究〉即在探討揚州學者於《尚書·禹貢》研究上整體表現的狀況。該文借助評介夏之芳（1723年進士）、孫喬年（?-1765）、焦循、成孺（1816-1883）等四人，專門詮解《尚書·禹貢》的四部著作，探討揚州學者研究〈禹貢〉在治學精神上的實際表現及其影響作用，研究結果以為揚州學者在〈禹貢〉研究上，表現出具有「博採」以求精益求精和解決實際問題的「重實務」的治學精神。

〈禹貢〉記載的相關內容，從現代學術分科的角度，應該可以納入地方史的研究之中，中國傳統地方史的著作一向受到重視，甚至如果從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的角度，或早期歷史經由口傳而存在的事實來看，則《詩經》的十五〈國風〉，未嘗不能做為早期的地方史來看待，地方史在清代乾嘉時期章學誠（1738-1801）眼中，更具有特別的地位，因而大力地加以提倡，章氏對地方史的重視，當然不會僅是他個人的睿智選擇，揚州學者也同樣重視地方史的書寫與研究，張連生〈清代揚州學派與揚州地方史研究〉即要探討揚州學者在地方史書寫與研究上的表現及其呈顯的學術精神，以瞭解揚州學者有關地方史研究的實況。該文主要通過分析阮元、汪中、焦循、劉寶楠等人，有關揚州相關的歷史與地理的研究及貢獻，尤其是對揚州水利事業的共同重視，以探討揚州學者在治學上的表現，結論認為在揚州地方史的研究上，揚州學者確實有「博採」與「精於考辨」的共同表現，這同時也顯示揚州學者的務實精神，更可以證實張舜徽所謂「博通」的治學精神，確實存在於大多數的揚州學派學者身上。

揚州學派是乾嘉學術發展的高峰，學術高峰當然不可能憑空而起，在正常的狀況之下，學術必然是累積而成，因此會有一個明顯或潛藏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除政治的影響力之外，當然也與某些特殊學者的提倡及其認同的學術內涵表現脫離不了關係，清代的官方意識一直是以朱子之學為宗主，清初表現的則是更為徹底

的尊崇態度，楊菁〈朱澤澐的朱子學〉的主要內容，即是在清初強烈尊朱學的潮流下，探討揚州尊朱學者朱澤澐 (1666-1723) 的學術表現，並比較其與同代的另一位尊朱學者王懋竑 (1668-1741) 在學術表現上的異同高下。此文主要是透過詳細考察兩位以《朱子年譜》的方式，呈現對朱子之學解讀的學者，朱澤澐對朱子之學的體認，以及王懋竑的學術表現的差異，因而突顯出朱澤澐學術的內容特色。文中認為朱澤澐的觀點主要是根據朱子的文集、語錄等文獻資料，以論證出朱子為學以成德的工夫次第，朱澤澐為學的目的，最主要是辯駁朱子僅知「道問學」觀點的訛誤，因而選擇與此一議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目的論」式的單向詮解，用意即在證明朱子在「尊德性」上表現的確實性，因而特別著重在朱子之學在王道、事功等方面具有實踐可能性的踐履價值，以證明朱子的「尊德性」之教，的確是比陸王「尊德性」的「虛」教來得「實際」，這同時也見王懋竑吸收陸王之學以詮解朱子之學的不夠純粹。研究結果認為透過朱澤澐高度推崇朱子在「尊德性」實踐上的表現，可以看出朱澤澐「實事求是」且注重「德教」的學術內容；同時也認為朱澤澐的學術觀點影響到乾嘉時期傾向朱學的「宋學」學者，例如劉台拱 (1751-1805) 等的學術表現。

學術發展除前輩學者的影響之外，同時期不同地域或不同學術流派等學者的互動刺激，當然也是促成學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陳文和的〈揚州學人與錢大昕〉就是在探討揚州學者與同時代的其他地區學者間，在學術觀點上的互動影響關係。此文經由分析錢大昕 (1728-1804) 與程晉芳 (1718-1784)、汪中、王念孫、劉台拱、阮元、凌廷堪 (1755-1809)、焦循、王引之等揚州學者交往與學術討論，以及揚州學者對錢大昕學術成就的肯定性評價等實證資料，以論證錢大昕在當時的學術地位、學術表現的實況，及其與揚州學者在學術交流上，諸如：博通的精神、治學路向，尤其是天算之學等等相互間的影響作用<sup>10</sup>。

學派的分類以及所謂整體學術精神的表現，當然是歸納實際存在的重要學者的表現而得，就學派的內部發展而言，學者所處歷史時空出現的先後序列，很自然地就可能具有一種學術史的意義，田漢雲的〈論汪中的經學思想〉與陸寶千的〈汪中的學術地位〉兩文，均在探討揚州學派中較年長的汪中學術的相關表現、貢獻及其

<sup>10</sup> 有關乾嘉學者的交遊取友與學術發展的影響關係，張晶萍：〈乾嘉學者的學術交流〉，《安徽史學》，2002年第2期，頁16-20一文，亦有相近的觀點。

應有的學術地位。田漢雲考述汪中生平的苦難境遇，以及與杭世駿(1697-1772)、程瑤田(1725-1814)等二十多位當代學者為友的實況，並進而分析其經學思想內容與其生平經歷及其以學會友間的關係。文中認為汪中身處於乾嘉時期「實事求是」的學風中，經學成就的最主要表現，大致是在經書文字考證，以及整合百家義理詮釋的宏通等方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幾點，包括：考證有關墨子之學與儒學間在學術上同源而互補的價值；論證荀子為孔門嫡傳事實的觀點<sup>11</sup>；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取向；從女性人權角度思考問題的取向；注意思索儒家經典義理在「經世致用」實際操作上的不足之處。最後認為汪中的訓詁考證方法與整合經史百家以濟世的思想，對當代與後代學人都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汪中因而成為清朝中、晚期學術史上不能忽略的承先啟後的重要人物之一。陸寶千先生主要在駁斥對汪中的不當批評而確定其應有的學術地位，該文經由實際歸納比較汪中論著與顧炎武《日知錄》內容表現與學術精神上的承繼關係，以及時人與後世的正負面評價，因而確定汪中的學術成就與地位，認為汪中學術宏博，在經學上固稍遜於顧炎武，但在文學上，尤其是駢文的成就，則超越袁枚(1716-1797)與洪亮吉(1746-1809)，陸先生同時經由這些論證，駁斥章學誠及其後繼者批判汪中的言論，認為都是一些不可信的謬言。

就梁啟超(1873-1929)以來，多數學者所認知的以考據訓詁為主要內容特色的乾嘉學術而言，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的學術內容與表現，當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將王氏父子排除在外，則乾嘉學術的光芒必然失色甚多，鄭吉雄的〈高郵王氏父子對《周易》的詮釋〉及錢宗武〈王氏父子《尚書》研究的語音學方法〉兩文，即在探討王氏父子進行詮解《易經》與《尚書》兩本經典之際，表現在方法上的實況與價值。鄭吉雄旨在探討王氏父子詮解《易經》的方法，並兼論經與傳在《易經》詮解上的地位與關係。文章主要以《經義述聞》中論及《易經》之文，探討王氏父子詮解《易經》的方法與治學精神。經由具體文獻資料的分析，認為「經典之文，言必有序」是乾嘉學者的共識，「本經與諸經內證通貫，追求全經義例一致」是王氏父子詮解《易經》的基本原則，闡明《易經》的道理而非《易傳》的義理，則是王氏父子詮解的目的；再根據實際案例的分析說明，證明傳統視《易經》的《經》

<sup>11</sup> 有關清朝學者研究子學的歷史考察，參見劉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一書所述，有關清儒對《荀子》與《墨子》的研究，見頁191-222的討論。



與《傳》為一體而進行研究的觀點，正可以糾正現代不少研究者將《經》《傳》離析為二而進行毫不相干研究的誤繆；另外則是經由《經義述聞》對《周易述》的負面批評，分析王氏父子在易學觀點上與惠棟不同之處。透過此文的分析討論，除對王氏父子詮解《易經》的原則可以有進一步的瞭解外，對於清代乾嘉學術中吳、皖、揚分派的學術依據，以及現代易學研究者在方法上出現的問題，均可以提供部分進行反思檢討的具體例證。錢宗武之文旨在探討王氏父子研究《尚書》的方法，在語音學上的意義與價值。此文以《經傳釋詞》和《經義述聞》收錄的相關例證進行分析，探究王氏父子解說《尚書》的過程中，由於本身精通古音學、熟悉古典文獻、精於實際語料的歸納分類，再加上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因而表現出來的既有承繼又有創新的語音學的詮解方法與內容。文章認為王氏父子解說《尚書》的具體方式，主要是以「音義關係」為前提，以「音聲求義」為方法的解讀，此種詮解方式比較有效地說明《尚書》中有關虛詞的性質、連語的方式及有效取得通假本字的方法，不僅對《尚書》的解讀大有助益，同時王氏父子此種「因聲求義」以解讀虛字、通假字及連綿詞的方法與內容，實際上就是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經學，再用經學研究推動語言學研究的相輔相成的治學方法，因此無論是對經學或語言學研究，都具有實質的意義與價值。

焦循著書數百卷，治學範圍廣泛，研究內容包括經學的《易經》、《尚書》、《毛詩》、《三禮》、《左傳》、《論語》、《孟子》等內容，尤其以「易學」為最；精於天算之學，且有相關的著作；又有地方志書以及古文、詩、詞、戲曲等等文學相關的論著，這些著作均有其個人的創見與學術價值，絕非泛泛之論可比，係乾嘉學者中少數較為「博通」的學者之一，阮元因認為其學「精深博大」，實為清代學術「一大家」，故以乾嘉學者中最高榮譽的「通儒」名號稱許之<sup>12</sup>。張高評的〈焦循《春秋左傳補疏》芻議〉、劉玉國的〈焦循《毛詩補疏》及其訓詁方法〉、劉建臻的〈焦循遺稿《古銅鏡錄》考辨〉及賴貴三的〈焦循手批《柳宗元文》彙評〉等四文，分別從經學、訓詁學、考證辨偽學與文學等不同的學科角度，對焦循的相關學術進行探討，此亦可稍見焦循治學範圍與方法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張高評之文旨在探討焦循《春秋》之學表現的內容及其隱含的著作目的。此文經由考察發

<sup>12</sup> 參見〔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二集·通儒揚州焦君傳〉，《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上冊，卷4，頁475-481。

現焦循春秋學在博通考據的方法之下，卻隱藏著立意要對杜預 (222-284) 及其《春秋經傳集解》「摘奸發伏」立場出發的研究態度，因而造成以類比所得的「或然」為「必然」的定論，焦循於是指責《左傳》某些內容「悖理」、指責杜預詮解《左傳》的觀點都是刻意為晉朝司馬氏諱飾的謊言<sup>13</sup>。文中認為焦循的春秋學所以出現此種不當地故入人罪的詮釋方式，應該是受到《公羊傳》的以義解經及漢代以來形成的「尊君至上」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過焦循對《左傳》表達的思想，雖不免帶有過度惡意的「前見」，但對《左傳》文辭之美則相當欣賞，並且還能發現《春秋》「以變為義」和「以因為義」的「雙重性」的「書法」意義，以駁正杜預等以名字為褒貶的誤判，不愧「博通」學者的封號，此文大有助於對焦循春秋學的內涵及其發現、偏頗及其成因等方面較為深入的瞭解。劉玉國之文旨在考察焦循的詩經學觀點與訓詁方法。經由歸納分析《毛詩補疏》的表現，可知焦循此書的著作目的，主要是在糾補陸佃 (1042-1102) 與王應麟 (1223-1296) 等在地理及鳥獸蟲魚等解說上的闕漏與訛誤，以及毛《傳》與鄭《箋》詮解觀點異同的辨析。焦循解《詩》特重「溫柔敦厚」詩教內涵的發揮，以為「理」係爭端之源而「情」則為息爭之鑰，故其解《詩》多以「情」之發抒為重點，並將其納入「以禮代理」的命題中，強調「情」的社會功能，開創了新的解說視野；訓詁方法則以「因聲求義」為原則，並且博採方言、土語、書面資料等為輔助；特別注意音韻、右文、句法、上下文及語境等文本形式的作用，以求得較為正確之詮解。其博採方言、土語的研究方法，頗具有田野調查的精神，至其「右文求義」的方法，則大受現代語言學家沈兼士 (1887-1947) 的稱美，經由此文研究可以比較深入的瞭解《毛詩補疏》的內容表現、焦循詩教的觀點及其訓詁的方法。劉建臻之文旨在考辨收藏於揚州市圖書館，題為「焦循遺稿」的《古銅鏡錄》之善本書是否為焦循「遺稿」的真偽問題。此文綜合焦循的治學態度、讀書習慣、交友實況、生活習性等各方面的資訊，斷定《古銅鏡錄》一書絕非焦循輯錄之書或自己之論著，實際上不僅不是善本，還是一本毫無價值的偽託之書；接著經由考察書中表露的相關訊息與收錄內容的詳細比對工

<sup>13</sup> 有關清儒批判與糾正《左傳》杜《注》的歷史考察與批判的價值，可參考劉家和：〈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58-282。文中亦涉及此文討論的主題，兩文可以互參。

作，因而確定此書乃不知名之人士，抄錄馮雲鵬與馮雲鵬（1811年進士）兄弟輯錄的《金石索》一書中〈金索六〉銅鏡部分的內容而成，收藏者不知而濫題焦循之名致誤，此文對《古銅鏡錄》一書的內容與《金石索》相關內容的關係與差異，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比對，《古銅鏡錄》偽託之跡因而無所遁形；對焦循讀書習慣與治學精神及相關經歷的考察，對焦循學術精神與表現的瞭解亦具有部分參考價值，同時經由此類假借學術名氣「偽託」情況的出現，間接證明焦循學術成就上具有較高的評價與較廣泛的影響作用。賴貴三之作主要在考察焦循閱讀柳宗元（773-819）文章之際的「讀者反應」狀況。此文經由實際的考察，發掘出長期未被充分注意的焦循閱讀柳宗元之文時的批語及其對焦循文學觀的意義，文章首先詳考焦循學習文章的經歷與相關意見的說明，以見焦循文學思想的淵源及其創作的理論內涵；再經由考察《柳宗元集》傳世版本的概況，以見收藏於臺灣師範大學的焦循手批《柳宗元文》之書在版本上的獨特性質；接著輯錄焦循手批《柳宗元文》一書的批語，經由歸納分析而見批語所表現的風格、技巧、淵源、政教論等與文學相關的內容，以見焦循實事求是的閱讀習慣、對柳宗元文的吸收及高度的推崇態度、對柳宗元參與王叔文（?-806）等「永貞革新」的正面肯定意見，最後並分析焦循可能受到柳文影響的狀況，文末則附錄了《柳宗元文》之篇目與焦循批語的輯錄。此文不僅提供給文學與版本相關的現代研究者，一份未曾見識過的文獻資料，同時也對焦循文學相關觀點進行考察分析，這對焦循文學觀的研究與瞭解當有正面的助益。

乾嘉學術後期學術的中心人物，就學術傳播與領導的地位而言，無疑要屬被《清史稿》形容為「博學淹通……歷官所至，振興文教……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的阮元<sup>14</sup>，阮元不僅身率同僚共同創造出他生長的揚州家鄉「今天為我們熟悉的十八世紀揚州郡那閃閃發光的形象」<sup>15</sup>，同時也在外地創建以培養人才為主的教育處所，並因其長期的關心與支持，於是形成一種學術研究的「場域」，無論是浙江的「詁經精

<sup>14</sup> 見趙爾巽、柯劭忞等編，啟功等點校：《清史稿·阮元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364，頁11424。

<sup>15</sup> 見〔美〕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3。此書討論了阮元在文化事業上的努力與貢獻，以及對揚州文化發展的正面影響作用。全書旨在討論揚州士大夫群體及文人社會網絡關係的建立等相關因素。

舍」或廣東的「學海堂」，都對清代後期及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sup>16</sup>，具有不可磨滅的重大價值，尤其後來廣東的「學海堂」不可否認地「成為中國南方儒家學術研究中心」<sup>17</sup>。祁龍威先生的〈讀阮元《學經室集》札記〉、章權才先生的〈阮元與清代經學〉及陳鴻森的〈阮元學經室遺文輯存（增訂本）〉等三文，即從不同的學術方向以探討阮元的學術表現與成就。祁先生之文旨在透過閱讀《學經室集》以考察阮元的學術淵源與揚州傳統文化、先賢學者、鄉先輩與同代學友等的關聯性及其治經宗旨與方法<sup>18</sup>。文中指出《學經室集》以經、史、子、集的內容為編次的次序，阮元在文章中多次提及自己曾受《文選》之學的影響，然考其影響作用則主要表現在訓詁解經方面而非在詞章上；其次在個別學者方面，阮元曾提及賈稻孫（1714-1777）、李惇（1734-1784）、任大椿（1738-1789）、顧九苞（1738-1781）、惠棟、戴震、王念孫、汪中、劉台拱等等鄉先輩學者的啟發教導，同輩學者友朋間除其關係最為密切的族姊夫焦循外，還有江藩（1761-1831）、凌廷堪等人，至於阮元最崇敬的學者則以顧炎武、全祖望（1705-1755）、惠棟、戴震為最，阮元即在這些相關學者的啟發、牽引、切磋下，形成其崇尚經世之學的以實踐為重，養士為用的治學目的；以及由訓詁以明義理，實事求是以推明訓詁條例的治學方法。此文研究成果除可見阮元的學術淵源、治學方法與治學目標外，同時亦可糾正部分學者所謂乾嘉學術「為考據而考據」而缺乏義理追求的誤說，明確表達了揚州學派的治學宗旨。章權才先生此文旨在辨明阮元的經學思想及其在清代經學史上的學術地位。文中主要是歸納阮元對王陽明心學的批判、對「知行合一」的「一貫」宗旨的張揚、推明古訓「實事求是」的自詡、推重漢學而兼採宋學的治學態度，以及重視自然科學知識與教育等等學術與行為觀點的實際表現，以見阮元學術的實際內涵。此研究成果不僅可以有效駁斥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所謂「一個史料辨析者」、「封建貴族階級的保守性表現」等的謬說，同時也間接證明清代學術的內涵確實具有延續顧炎武等「經世致用」內涵的一面，故章先生此文不僅說明阮元學術的詳細內容，同

<sup>16</sup> 見〔美〕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4。

<sup>17</sup> 有關阮元生平學政經歷、學術影響等較詳細的資料與論述，參見王章濤先生：《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所言，此書渥蒙王先生寄贈，謹此致謝。

<sup>18</sup> 有關阮元學術內涵發展的研究，相近的意見有宋麗群、孟鷗：〈阮元取得輝煌學術成就的原因〉，《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3期（2004年9月），頁59-62一文。

時也說明了清代主流學術經世實踐的本質<sup>19</sup>。陳鴻森之文主要是輯錄匯聚阮元傳世

<sup>19</sup> 章權才先生文中特別強調的乾嘉學術注重經世實踐的本質，近年來經過相關學者的深入研究，大致已在學者間取得比較一致性的共識，不過某些大陸學者還是固執地堅守那些早該拋棄的謬誤觀點，例如劉志靖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書中，居然還在傳述那類乾嘉學術「失去了顧（炎武）氏的經世宗旨，成為為考據而考據的專門學問」的謬說。見王繼平主編：《晚清湖南學術思想史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7。某些大陸學者不知道是否因為受到現在市場經濟制約下，過度的「商人觀點」的影響，因而將現代經濟理性下的思考模式，不當地投射到傳統的中國農業文化制約下的社會中去，因而全然無法瞭解傳統中國儒者學術的終極關懷，絕對不可能是一種與社會現實脫離關係的現代式的「純學術」研究。現代某些大陸學者指責乾嘉學者僅知進行「專門學問」研究，而失去「經世宗旨」的原因，如果不是僅看到當時學者的表相而無法進入學者較深層的社會關懷，因而混淆「學術表現」（研究的對象與設定的議題）與「學術目標」（研究的終極目的）的學術程度問題，則這類學者的譴責表現，根據合理的推測，很可能是一種積極上表現學者超越前人虛幻「優越感」作祟的結果；更可能是消極上藉此以解消自己研究上，因為受到傳統學術不自覺的經世要求，但在現代學術專門化的制約下，無法實現而產生心理焦慮的一種自我抒解方式。歷史地來看，梁啟超靈巧而粗糙的對清代學術的解說，以及在其影響下的胡適與陳獨秀等於上個世紀初引導形而上的「新文化運動」學者，在當時以「反滿清」與「反傳統」做為「救國圖存」的前提要件強烈影響之下，因而刻意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惡意的」與「污衊性的」非理性評價，導致無法或不願深入瞭解清代學術的實際內涵，理當受到諒解與尊重。但是到下一個世紀的今天，如果還有人依然無法瞭解這類刻意「污名化」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意義和普遍限制，還再繼續擁抱著這類早已過時的謬說，則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若地下有知，恐怕不免要責怪我們這些現代的研究者未免太不長進了。所謂經濟理性意義下的「商人觀點」，就是在商人的眼中，這個世界並不存在「人群」與「人」，僅僅存在「市場」與「消費者」；根據此一觀點衍生的學術研究價值，就是學術研究之際僅會注重是否具有學術的「創新」，很少甚至不關心「道德」與「實踐」的問題，這就是現代學者所謂「純學術研究」的真諦，這種在強調個人「主體性」與「利益性」前提下形成的學術研究模式，當然不會是生活在重視家族群體利益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內的乾嘉學者所能意識到的研究概念，即使有恐怕也還不至於成為一種主流思考。這還可以舉法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1944-）透過十八世紀滿清政府處理「荒政」之際，展現的高度組織能力與效率，糾正那些否定中國政府具有行政效率的謬說為旁證，證明乾嘉學者不可能如某些學者所指責的缺乏經世的關懷。魏氏特別強調在抵抗抗荒的行動中，地方精英特別是鄉紳，對救荒的積極參與達到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地位，這些所謂精英鄉紳當然包括乾嘉學者這類人，該書至少提到阮元已經注意到組織地方精英協助賑災的積極作用，這也就可以旁證傳統學者無論是自願或逼於情勢，都不可能逃避積極參與經世行動的基本要求，所以將乾嘉學者定位為「為考據而考據」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學者」，恐怕很難說得通。見〔法〕魏丕信著，徐見青譯：《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書所論，有關精英鄉紳參與救荒的積極參與的重要地位，參見該書頁4-6及頁260-264的討論。這種拒絕比較正確答案的現象，當然不會僅存在於人文學界，美國科學哲學

文集失收的文章。此文將原本輯錄分六次發表在《大陸雜誌》的文章<sup>20</sup>，重新考證整理，匯聚為一篇，以便學者利用。由於阮元學官兩棲的特殊身分，部分具名阮元書寫之文，實際卻乃幕僚代筆之作，故此文重訂之際，除增補新見之文外，凡稍涉代作嫌疑之文，皆加以刪除，寧缺勿濫，與發表於《大陸雜誌》者相較，增補二十六篇，因稍涉嫌疑而刪去者七篇，最後共得較可信之阮元遺文百六十一篇，與先前發表於《大陸雜誌》者頗有不同。輯錄學者未收之遺文，面對龐雜而未知之文獻，若無寬廣之眼界與博通之學識，必如無舵之舟而缺乏方向感；即令以廣博之學養而進行輯錄，其事亦有如入文獻之大海以捕撈不知數量之細針，此種純屬「學術服務」性質之工作，輯錄者常用力甚大而收穫極小，然對相關學術之作用，則可能影響甚大，此文所得成果，因而對阮元學術與相關問題的研究，具有比較實質的價值與貢獻。

學術的演變發展與人類生命有其類似之處，總有新生的興盛與衰老退場的結局；並且總不斷的有某些異質或同質異構的新東西加入，使得原本就具有「混雜性」的學術更為混雜，這種「混雜性」與傳統的承繼與離散的發展關係，大致如大陸學者孫景堯討論「影響研究」之際，所謂中心與邊緣不斷融合變化的「活的傳統」之義<sup>21</sup>。美國科學哲學家保羅·法伊爾阿本德 (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 從純粹的「科學方法」中，已經就有「文化在變化，與其他文化互動，從中產生的不

---

家保羅·法伊爾阿本德就提到他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界的現象是：「科學沙文主義……抵制改變現狀。」又說：「人們從來沒有從一個思想的全部結果去考察它，也從沒有給予一種觀點以它所應有的機會。……沒有人瞭解它，可是又人人都用它做為落後和混亂的範例。」看樣子這種「學術沙文主義」無論在任何學科內，可能都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法伊爾阿本德之論見〔美〕保羅·法伊爾阿本德 (Paul Karl Feyerabend) 著，周昌忠譯：〈關於相對主義的補篇〉，《反對方法》（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33-34。至於大陸學者無法參與經世的焦慮，可參考如：趙毅衡：〈走向邊緣〉，《讀書》，1994年第1期，頁36-42；劉曉林：〈論20世紀中國文學知識者形象的邊緣化傾向及其角色選擇〉，《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頁59-64等兩文的簡單論說。

<sup>20</sup> 見陳鴻森：〈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1-6)〉，收入《大陸雜誌》第103卷第1期（2001年7月），頁44-47；第103卷第2期（2001年8月），頁38-48；第103卷第3期（2001年9月），頁26-48；第103卷第4期（2001年10月），頁1-10；第103卷第5期（2001年11月），頁14-22；第103卷第6期（2001年12月），頁3-7等處。

<sup>21</sup> 參見孫景堯：〈中西文學關係研究的「有效化」：兼論「影響研究」和「世界性因素」〉，《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3期（總44期），頁18-32的討論。

確定性反映在它們的世界之中」的結論性意見<sup>22</sup>，更何況是以經世實踐為終極關懷的傳統儒學，還必須因應世局的實際需要而轉換，則其變動發展性也就可想而知。中國學者經常抱持的是類似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1917-) 所說的那種具有「恆久不變」的目的與特徵的「傳統」觀點<sup>23</sup>，但此種永恆不變的「傳統」，實際上並不存在。以在西方字源學的意義而言，「傳統」(tradition) 一詞，實與具有轉換改變與背叛意義的「翻譯」(translation)，有著難以割捨的藕連絲繫關係<sup>24</sup>，顯然也並不是那麼的「永恆」；再就中國本土文化關懷而言，《易經·繫辭下》就有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論，強調萬事萬物的走向不可能永遠靜止不動的「變」的觀點，借用現代的學術性術語陳述，即已有一種「反本質論」的傾向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影響著幾乎所有中國學者的「進化論」的社會學版本，更是以「變」為最高準則，美國華裔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周蕾 (Rey Chow, 1957-) 因而纔有「現代中國人知道自己不能墨守一個靜止不動的傳統而生存下去」的說法<sup>25</sup>，故就非靜止的認知意義而言，事物在時間中必然會產生發展變化，學術的由微而著而盛而衰的轉變，毋寧是「變」的觀點中一種非常自然的代序。當某一具有特徵的學術門派在全盛階段之後，除非另有促使其「重生」與「再現」的條件與天才的出現，否則在前輩學者大師的高學術成就光環籠罩下，逐漸走向研究對象細緻零碎化，總結與反思學術成果，甚至進行補苴的研究方向，似乎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正常發展。無論承不承認存在揚州學派，但王氏父子、汪中、焦循、阮元……等等揚州學者的表現，是為乾嘉考據學發展的高峰，道光以下的學術主流地位，則逐漸轉移給標榜恢復漢代今文學的「常州學派」，這應是相關學者間一個比較具有共識的認知。出生於乾隆後期而成長活動於嘉慶與道光年間的汪喜孫 (1786-1847)、劉文淇 (1789-1854) 與劉寶楠等的學術表現，即部分呈顯出上

<sup>22</sup> 參見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著，周昌忠譯：〈關於相對主義的補篇〉，《反對方法》，頁 321。

<sup>23</sup> 參見〔英〕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導論：創造傳統〉，霍布斯邦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 年），頁 12。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頁 2。

<sup>24</sup> 參見〔美〕周蕾 (Rey Chow) 著，孫紹誼譯：《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頁 271-272。

<sup>25</sup> 見周蕾著，董之林、張京媛、陳順馨、陳惠芳、陳敏娟等譯：《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 年），頁 63。

述的設想認知。

楊晉龍的〈攷證與經世——汪喜孫研究初探〉旨在探討身為汪中之子的汪喜孫，其學術的淵源與實際表現，以及如何承繼、發揚與實現其父的學術主張<sup>26</sup>。此文首先歸納汪喜孫論著中表現的內容思想後進行分析，經由探討汪喜孫考證的作為與經世目的之間的關係，因而確認汪喜孫與汪中的學術承繼關係與共同的治學目的。根據汪喜孫論著呈現的內容，可知汪喜孫的經世觀受到其父的感召啟迪，其目標是以學者個體的「經明行修」為基礎，以助社會達致「三代之治」為終點。汪喜孫非常自覺地瞭解「考證」只是治學必經的初步過程，經由「考證」的手段追求正確的經義，亦即聖人的睿見，以達到經世的正面效應，纔是治學的最終極目的。由於重視實際的經世效用，治學態度上因而主張博取諸家，反對漢學與宋學的無謂之爭，學術的重心傾向於針對與實際民生相關，諸如：水利、禮儀、賦稅、兵農等實作層面問題的考求與解決。文章清楚地說明了汪喜孫的學術內容及其承襲汪中觀點的實際內涵，以及所受顧炎武等觀點影響的狀況，有助於對揚州學派基本精神的保持與後續發展情形的瞭解。

清代乾嘉時期以後研究《左傳》而被現代人傳為美談的學術事蹟，無疑是劉文淇(1789-1854)、劉毓崧(1818-1867)、劉壽曾(1838-1882)等祖孫幾代長期專注於《左傳》舊注、舊疏的研究一事。沈玉成(1932-)認為劉文淇的研究「囿於章句訓詁，忽視義理探求」，因而也同時宣告清代以考據學研究《左傳》的尾聲<sup>27</sup>，沈玉成囿於常識性觀點，因而忽視乾嘉學者「義理探求」的批評，固有不足之處，然謂劉文淇總結乾嘉學者《左傳》研究的觀點，則正可與前文所論相印證。林慶彰先生的〈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研究〉即在考察劉文淇家族研究《左傳注疏》的來源。林先生在此文中認為揚州學派成員對《十三經注疏》的專門性研究，應該是學術專業研究對象上區別於吳派與皖派的一個重要特點，劉文淇家族三代對《左傳》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則正是其中一個可以證實此一觀察的實際例證，因而以《左傳

<sup>26</sup> 有關汪喜孫的生平與著作及其與朝鮮學者交往諸事，參見拙著：〈汪喜孫的生平與著作編刊相關問題述論〉，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七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上冊，頁165-191與〈汪喜孫研究概述〉，《中國哲學》第25輯（2004年8月），頁558-600兩文之介紹。

<sup>27</sup> 參見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28。劉文淇研究《左傳》的相關資訊，參見頁318-320；頁326-328。



舊疏考正》為分析對象，探討劉氏家族的著書動機，歸納全書的體例。根據研究所得認為劉氏此書最主要的目的，乃在分辨《左傳正義》中出現的文句，何者是屬唐人之說？何者屬劉炫之論？何者是屬於劉炫之前的舊疏？林先生歸納該書的內容而獲得劉氏家族用以分判文句屬性的七項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比較有效地引導讀者，對《左傳注疏》行文與意見的大致來源進行區隔。從《左傳舊疏考正》所得的研究表現，同時也證明劉氏家族對《左傳正義》在研究上的專注與深入<sup>28</sup>。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僅清楚說明劉家《左傳舊疏考正》的內容；對閱讀《左傳》之際，相關資料來源的分判瞭解，也有正面的貢獻；同時提供揚州學派對《十三經注疏》研究的投入與關心，以作為判別揚州學派與吳、皖兩派不同的一個比較確實的證據，這當然有助於對於揚州學派學術內容特色的瞭解。

清代劉文淇學術家族的最後一位具有學術與政治影響性的學者，當然是那位年不及中壽而在學術上頗受肯定，但在政治的認同上卻甚受爭議的劉師培(1884-1919)，劉師培在一九〇三年二十歲時抵達上海，結識了革命黨的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陳獨秀(1879-1942)、章士釗(1881-1973)、張繼(1882-1947)、蘇曼殊(1884-1918)、鄒容(1885-1905)等人，並參加革命黨的公開與秘密的集會，鄒容還曾親自書贈「中國自由神出現」七字隸書給他，後來還被人美稱為「東亞盧騷」。但一九〇七年初抵達日本東京後，不僅參與章太炎、張繼等人發起的「倒孫(中山)風潮」，並自創「社會主義講習所」，創辦《天義報》和《衡報》，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想」，同時還大力抨擊革命黨，並在一九〇七年的年底回上海，秘密投靠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辛亥革命後因而被革命黨人逮捕，經章太炎、蔡元培的營救而獲釋；袁世凱(1859-1916)主政時期，又加入「籌安會」，發表《君政復古論》鼓吹復辟，失敗後逃到天津；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敦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門專任教授，在五四運動反傳統的熱潮中，則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創辦《國故月刊》，宣揚保存國粹，當年十一月二十日病逝於北京<sup>29</sup>。歷觀劉師培在政治立場上的反覆與反當時革命潮流的一生，卻始終受到章太

<sup>28</sup> 有關揚州劉氏家族的相關資料與深入研究《左傳》，包括〈左傳舊疏考正〉在內諸書的學術表現、意義、價值等諸事，較為詳細的說明與分析，可以參考曾聖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的討論。

<sup>29</sup> 劉師培相關經歷的敘述，參考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冊，頁14-34，陳鐘凡等十二家相關的傳記與序跋之言而成。

炎在學術上的推崇與各方面的照顧，這實在是一件相當奇特的事，湯志鈞先生的〈章劉交誼及其他〉即在探討此段幾乎是章太炎一面倒照顧劉師培，劉師培卻不大領情的這一段奇特的「友誼」及其成因。文章首先敘述說明章、劉二人建立友誼以及分裂的經過，並分析所以產生合作及導致分裂的種種轉變和兩人的政治認同與學術專業上的關係。文章認為兩人的交情建立以後，固然因為劉師培政治立場不斷轉變，因而受到強烈衝擊，但主要的問題實際是在劉師培一方而不在章太炎，湯先生認為章太炎所以對劉師培如此厚愛，主要是兩人在學術專業的認同上，都堅持古文經學的立場<sup>30</sup>，劉師培雖然由於年輕好名與政治上的幼稚而使得名譽大損，同時也影響到學術的發展，但其在學術上的表現以及兩人年齡上的差距，都使得章太炎刻意遺忘劉氏某些不當的政治行為，始終以學術長者的態度照顧與協助劉師培，此文可以讓讀者對章太炎提攜照顧劉師培的實情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劉文淇家族幾代投注心力專門研究《左傳》舊注、舊疏一事，當然是乾嘉學者中比較特殊的案例，不過父子兩代共同完成某一部專經著作，在乾嘉學者中倒有多起，除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共同完成《經義述聞》外<sup>31</sup>；劉寶楠與劉恭冕(1824-1883)父子共同完成《論語正義》則是另一顯例，班吉慶的〈廣徵《說文》探蹟索隱——劉寶楠《論語正義》訓詁特點研究之一〉就是希望透過《論語正義》引錄上千條的《說文解字》的狀況，以考察劉寶楠訓詁方法的表現。此文歸納《論語正義》進行詮解之際徵引《說文解字》的實況後加以分析，以辨明此種徵引的作用及詮解之際使用的方法。就作用而言，主要用意在於協助詮解時，對經書文本相

<sup>30</sup> 章、劉兩人在學術上對古文經學的一致認同、在民初經學成就上堪稱「一時瑜亮」的事實，參見田漢雲：《中國近代經學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頁425-470的討論。劉師培後來一度轉向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因而與章太炎秉持的革命建國思想多所扞格，此後即與章太炎分道揚鑣，變成為反對革命者。章、劉兩人友誼所以產生變化，實與劉師培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關係最大，有關無政府主義的訊息，可參見趙廣洙：《劉師培的無政府思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王汎森：〈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大陸雜誌》第90卷第6期（1995年6月），頁1-9；〔韓〕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72-119等的討論。

<sup>31</sup> 《經義述聞》固為王氏父子共同完成，但其中恐多有王念孫刻意歸美其子王引之者，詳情參見學長陳鴻森先生：〈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年），下冊，頁244-257的討論。

關的字形、字音、本義、本字、引申、假借、同義詞等等進行訓詁意義的解讀；在方法上則主要是透過字義溯源、博採互參、實事求是等原則，以求得比較正確的解說；文章最後則提出《論語正義》在徵引《說文解字》以進行詮解時，在引文方面來源交代不清、在字形解釋方面誤從許說而誤、在字義方面過於單一專固等值得商榷的瑕疵。此文比較有效地分析《論語正義》引用《說文解字》的實況及其訓詁價值，同時由其使用文獻與意見的多方參照而博取兼採的表現，實亦可為揚州學派「重會通」增一比較可信的例證。

清代乾嘉學術的內涵所以常遭「純考據」的誤解，其中有一大部分來自於學者對傳統經學內涵的逐漸生疏，因而取用不恰當的學術判準，將社會面臨危及之際的儒家學術表現要求，不當的強加在社會安定時期的乾嘉時代的學者身上，不知乾嘉學者由於當時社會相對的安定，因而將學術重視關心的焦點，從如何促進整個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問題，轉移到重視社會實際禮儀的闕漏與如何執行的問題上，對乾嘉學者此一實際關心問題的經典表述，就是凌廷堪所謂「以禮代理」的說詞<sup>32</sup>，此說比較簡略地表達清代學術的轉變及其與禮學思想發展之間的關係。張壽安的〈明清禮學轉型與清代禮學之特色〉即針對清代純儒家以古禮為尚的禮學要求的發展，迥異於明代混融佛道而因俗之處的轉變，提出較為詳細的分析說明。文章的進行主要以歷史宏觀的發展角度，歸納《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針對著錄與存目收錄的禮學相關著作的評論，以及其他涉及禮學討論的清代學者的論述，進行較為細緻的分析，因而發現清代禮學以《儀禮》等「禮器」實用為重心的禮學思想與研究內容上的轉變<sup>33</sup>。全文實可當作一篇比較簡略的清代前期禮學演變史的緒論觀看，探討的內容雖與揚州學派無直接性的關係，然所得成果對揚州學者學術表現

<sup>32</sup> 有關凌廷堪學術內容及與戴震、浙東王學等之間的關係，「以禮代理」之說的發展，參見錢穆先生：《國學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下篇，頁107-117的討論。近年來凌廷堪的相關研究訊息，例如張壽安在禮學上的深入探討、張麗珠有關義理的研究等等，可參見商瑀：《一代禮宗——凌廷堪之禮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頁4-7的簡略紹介。

<sup>33</sup> 張壽安此文初稿曾以〈明清禮學轉型〉之標題，刊登於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第七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297-338，此文則為修訂稿。有關清代禮學更為詳細的討論，可參見將此文收入作為該書「第一章」的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一書深入而細緻的討論，此文收在該書頁29-128。

內容背景知識的瞭解，實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因而列入「附載」中。

### 三

此次學術研討會共發表有二十三篇論文（詳見「附錄」議程表），經過規定的評審改寫手續與作者的意願，收錄其中二十篇與另外兩篇相關的論文，以上即共同構成本書篇章的內容說明，論文排列大致按照「總論整體現象」及「學者個人研究」兩個大範圍排列；「學者個人研究」則依照研究對象生存年代的先後，同一研究對象則依照經、史、子、集等四部先後的次序排列。由於本書在學術內涵上雖不受張舜徽觀點的限制，但基本上接受「揚州學派」作為獨立學術門派的觀點，因而此種具歷史序列性質的排列方式，就有學術史傳承發展的意義，亦即希望透過本書篇章安排的內容呈現，讓讀者因而可以獲得一個相對明晰的清代揚州學派整體學術發展的大略輪廓，不至於僅注意到單篇論文的表現而失去整體性的學術關照。

兩次的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固然引發許多相關的研究風潮，但學者的研究重心依然比較集中在：單一學者的整體學術內涵的表現、某一專門學科或論著的內容分析、同一學風下治學共識的探討等等，學術研究的視野實均未離中國境內，這方面的研究當然還可以進行更為細緻與深化的研究，不過當時揚州學派學者中，其實也有與朝鮮學者來往者<sup>34</sup>，如阮元與汪喜孫等即曾與朝鮮「北學派」學者金正喜（1786-1856）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這就是個最明顯的例證，除金正喜外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朝鮮學者，以汪喜孫為例，至少還有金魯敬（號西堂）、金命喜（號山泉）、權敦仁（號彝齋）、申在植（號翠微）、洪敬謨、李尚迪（號蕩船）、金善臣（號清山）等人。此外揚州學者的論著，透過學者間的相互贈送以及購買等的方式，大量傳入朝鮮而在學者間流傳<sup>35</sup>，汪喜孫的《尚友記》，甚至以贈給金正喜

<sup>34</sup> 清代時期的朝鮮學者，每透過各種名目的使者身分而與中國學者往來。有關清代與朝鮮使者往來的情形，參見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書所述，該書頁142-148專論學者交往之事；往來使者的較詳細記載，見〈清朝與朝鮮往來使者編年〉，頁151-251。

<sup>35</sup> 參見〔日〕藤塚明直編，〔日〕藤塚鄰著：《清朝文化の東傳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頁507-527〈金阮堂舊藏書目錄〉記載之說明。

之故，完整的保持在朝鮮，中國本土卻僅有殘本流傳，完整本最後則流入藤塚鄰(1879-1948)的「望漢廬」中，可惜此一完整本至今猶無法回歸故土。由於取得資料的方便性，以及閱讀漢字並不會造成太大隔閡的關係，可以推知當時朝鮮學者對揚州學派的學術認知程度，當不會亞於是時中國本土的學者<sup>36</sup>，然有關中國與朝鮮學者的學術交流、學術互動關係等等，除早期日本殖民政府派駐漢城（首爾）帝國大學任教的藤塚鄰教授，曾經大力收集相關資料而進行比較的研究外<sup>37</sup>，此後雖還有極少數學者注意到清代乾嘉年間中國與朝鮮之間學術交流的問題，但這些學者都面臨一個相同的問題，即對乾嘉學術內容主旨與朝鮮當時學術狀況的瞭解，都無法有較為深入的全面性掌握，由於僅專精於其中一方的學術狀況，導致研究品質的無法提昇<sup>38</sup>，因此難有更進一步突破性的研究發展。至今為止，有關揚州學者的學術觀點在朝鮮的傳播的情形與學術地位如何？以及朝鮮學者如何評價揚州學者？朝鮮

<sup>36</sup> 此點參見汪喜孫編刊的《海外墨緣》一書的評論內容即可瞭解。該書收入楊晉龍主編點校：《汪喜孫著作集》，下冊，頁1201-1221。該書內容的歸納分析，參見藤塚鄰：〈汪孟慈の所謂海外墨緣の草本と金阮堂〉，《漢學會雜誌》第3卷第2號（1935年10月），頁37-64；中譯本見〔日〕川路祥代譯，楊晉龍校訂：〈汪孟慈所謂《海外墨緣》的抄本與金阮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125-142所論。

<sup>37</sup> 日本藤塚鄰教授有關清朝乾嘉學者與朝鮮學者交往的研究成果，見氏著：〈李朝學人と乾隆文化〉，京城大學文學會編：《朝鮮支那文化の研究》（漢城：京城帝國大學，1929年）；〈金秋史の入燕と翁、阮二經師——清朝文化東漸の一断面〉，京城大學文學會編：《東方文化史叢考》（漢城：京城帝國大學文學會，1935年）；〈汪孟慈の所謂海外墨緣の草本と金阮堂〉，同前註；〈汪孟慈と金阮堂——清朝文化東漸の一断面〉，《漢學會雜誌》第4卷第2號（1936年7月）；藤塚明直編，藤塚鄰著：《清朝文化の東傳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清・鮮文化交流の一斷層——金阮堂自畫贊歲寒圖を中心として〉，《漢學會雜誌》第10卷第2號（1942年10月）；〈以海東金石苑を中心とせる清鮮文化交流の研究〉，《東方學報》第13號之1、3（1942年）、《東方學報》第14號之1、2（1943年）；《日鮮清の文化交流》（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年）等處之論述紹介。由於有關中朝學術交流與學者交往諸事，至今為止大約只有藤塚教授的研究最為可信，因而本段有關朝鮮學者的資料與相關論述，多有參考取用藤塚教授之研究成果者。

<sup>38</sup> 除藤塚鄰的研究成果外，僅有〔日〕稻葉岩吉：〈金秋史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1卷第2號（1911年）；〔韓〕金庠基：〈關於金秋史一家同吳蘭雪問文學交歡——以梅龕為中心〉，《李丙燾博士華甲紀念論叢》（1956）；〔韓〕全海宗：〈清代學術與阮堂金正喜〉，《大東文化研究》第1號（1963年8月），收入全海宗著，全善姬譯：《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等少數幾篇。

學者的觀點在揚州學派研究上的價值如何？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學者加以解答，這些問題當然也都屬於揚州學派的研究範圍，正等待相關研究者進一步的開發研究，以便能更深入的瞭解揚州學派的學術內涵與影響，這也是本次研討會後，可以提供給相關學者一個比較具體的研究方向與研究範圍的建議。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楊晉龍謹識於南港